

# 軍隊、群眾與武鬥： 以1967年浙江文革為例

●張君龍

**摘要：**隨着文化大革命的升溫，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此後各地軍隊大量介入地方事務。本文通過軍隊內的揭發、文革小報、回憶錄、口述等材料與官方的材料比對印證，嘗試對現有的浙江文革敘述提出不同看法。在浙江，支左部隊在介入伊始就造成分裂，並與群眾組織的矛盾糾纏在一起，不僅沒有促進「大聯合」，反而引起更深的撕裂與更大規模的武鬥。以往雖有學者注意到這一運動範式以及軍隊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但和其他地區不同，浙江的支左部隊早於1967年8月就已經根據中央的直接指示對另一派群眾組織進行了「軍事包圍」，較1968年旨在軍事制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為早。儘管中央要求軍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軍隊的直接干預始終是中央掌控運動的主要手段。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 支左 武鬥 軍隊 群眾組織

1966年5月以來，全國群眾運動不斷升溫，文化大革命勢頭逐漸變得難以控制，尤其是1967年1月的奪權風暴後，各地的群眾組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分裂與混亂。為穩定局勢，1月23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的指示下發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以下簡稱〈支左決定〉），各地軍隊正式介入文革。但是從地方的角度看，軍隊的介入並沒有促進「大聯合」，反而造成了鋪天蓋地的「武鬥」。以往有關研究多聚焦在四川、重慶、廣西、武漢等地的武鬥，對浙江省的研究較少。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浙江同樣是武鬥的「主要戰場」之一，舟山地區的派性衝突甚至到1970年也沒有解決<sup>①</sup>。

單就浙江文革而言，已有一些學者進行過探討。如余汝信曾討論解放軍在浙江文革中扮演的角色，但與中央層面的細緻分析比較，對軍隊在地方支

左的論述就顯得有些美中不足，多為材料的堆列，對部分事件的敘述也不準確<sup>②</sup>。福斯特 (Keith Forster) 在 1990 年曾就浙江文革的派性問題寫過專書，由於當時在搜集材料方面並不如現在便利，其材料主要來源於《浙江日報》與《杭州日報》。然而，類似《浙江日報》這樣的省級大報並不會像群眾刊物那樣對地方上的武鬥和軍隊間的矛盾進行太多報導，所以福斯特的不少論點存在些許關鍵的錯誤，直接影響其結論中派性分析的準確性<sup>③</sup>。

董國強和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對地方派性衝突已有過大量研究，也注意到軍隊的特殊作用。在關於江蘇徐州的個案研究中，他們提出兩點結論：第一，現存的體制性因素沒有促成 1967 年前三個月群眾組織的分裂，而是軍隊的介入加劇了派性分歧；第二，派性分歧最大的因素是中央的不同意見，而不是戰爭年代不同軍隊譜系在支左問題上的分野<sup>④</sup>。這些現象都可以在浙江找到共通性，但與江蘇稍顯不同的是，除了給予軍火以展開「代理人戰爭」外，浙江軍隊還採用了「軍事包圍」的方法圍剿對立派別。魏昂德近年運用社會學的方法對廣西個案進行過專題研究，廣西的特點在於其大規模的軍事進剿發生在 1968 年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sup>⑤</sup>；又因為同期進行的越南戰爭，其地方軍政一號人物韋國清在文革中始終沒有倒台，所以軍隊得以維持組織大規模軍事進剿的能力<sup>⑥</sup>。這使得廣西成為一個獨特的個案。不過，筆者發現軍事進剿的情況並非僅限於廣西，浙江在更早之前就有軍隊的直接鎮壓。

本文通過軍隊內的揭發、文革小報、回憶錄、口述等材料與官方的材料比對印證，嘗試對現有的浙江文革敘述提出不同看法，尤其關注最為關鍵的 1967 年，並為武鬥爆發的原因給出部分解釋。文章初步認為，雖然軍隊的介入是為了促成大聯合，但是從一開始就造成了軍隊與群眾組織內部的分裂，其結果是釀成更深的矛盾與更大規模的武鬥。同時，儘管表面上中央對軍隊的要求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sup>⑦</sup>，但早在 1967 年 8 月，浙江軍隊就在中央的指示下對另一派群眾組織展開直接圍剿，而不是在 1968 年旨在軍事制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後才開始；此後，建立革委會所採用的辦法也遠不止赴京談判，動用軍隊始終是掌控運動的主要手段。從浙江的支左起源也可以看出，軍事參與在 1967 年就已經出現，並在此後被不斷被使用<sup>⑧</sup>。雖然文革期間「軍民團結如一人」的口號層出迭見<sup>⑨</sup>，但「文化大革命」很快就演變為「武化大革命」。武鬥幾乎在部隊的全程主導下進行，對於被圍剿的所謂「叛亂」份子而言，「支左」二字看似並不那麼輕描淡寫，反而伴隨着相當殘酷的打擊行動<sup>⑩</sup>。

## 一 群眾派性的形成與軍隊早期的介入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廣播，致使全國各地先後展開了校園裏的批判運動。3 日，浙江大學內隨即貼出針對校黨委的大字報，批評校黨委壓制運動<sup>⑪</sup>。隨着批判的進一步深

入，揭發的對象更牽涉校黨委的核心人物，如當時兼任校黨委書記的省委常委陳偉達。為了領導學生運動，根據中央的指示，浙江省委於5日決定抽調省級機關和省軍區的幹部組成工作組或聯絡組進校，其中軍區幹部二百餘名，含六十名團職幹部<sup>⑫</sup>。從工作組的成員組成可以看出，省軍區的一些幹部實則在文革的初始階段就已經介入了地方事務。工作組進校後，針對省委主要領導的批判被限制，一些相對激進的師生被打成反革命，運動受到了壓制。省委更壓下了浙大1,861名師生寫給毛澤東與中央要求撤換工作組的聯名信<sup>⑬</sup>。這些舉措引起部分學生的不滿。

8月5日，省委宣布工作組撤出浙大，此前受到壓制的學生紛紛解放。8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發布後，各式紅衛兵組織相繼成立，學生的聲勢愈來愈浩大。31日，從北京南下的學生和浙江醫科大學紅衛兵近萬人在省委大樓前「炮轟」省委，要求省委第一書記江華接見群眾。省委為此也採取了相應措施，江華等人抽調三十餘名公安幹部帶上紅衛兵袖章進入省委大樓維持秩序，並囑咐省軍區政委龍潛根據省委書記曹祥仁從北京帶來的「西糾經驗」（「西糾」即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是由幹部子弟學生領導的紅衛兵組織）組織紅衛兵司令部<sup>⑭</sup>。龍潛隨即召集軍區幹部及其子女開會，於9月4日成立「杭州市大中學校紅衛兵司令部」（紅一司），親自擔任輔導員<sup>⑮</sup>。

與之相對，各大院校的造反派指斥紅一司為「保皇派」，於11月12日聯合成立了與紅一司分庭抗禮的「杭州市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杭三司）。「地方國營杭州絲綢印染聯合廠」（杭絲聯）的工人造反派亦於11月初去省委大樓靜坐請願，在7日組織千餘人乘火車赴京，成立了「紅色造反兵團」，他們的造反行動受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與姚文元的肯定<sup>⑯</sup>。此後，省委和省軍區支持的保守派與造反派之間不斷發生衝突，先是部分保守派組織在省委第二書記李豐平等人的指示下，衝擊了造反派組織的批判陳冰（省委常委、省文革小組組長）萬人大會，後是造反派藉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斷召開大會反擊保守派組織<sup>⑰</sup>。在政治勢頭的反轉下，造反派於12月30日成立了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省聯總），並於當日凌晨3時向《浙江日報》奪權，群眾運動逐漸進入高潮<sup>⑱</sup>。

省級機關早在11月間就無法正常運作。江華當月上旬前往上海華東醫院住院接受治療，在醫院裏託付省軍區負責人龍潛和張秀龍說：「省委不行了，一衝就垮了，還是你們過硬，越衝越團結，今後全靠你們了。」<sup>⑲</sup>省軍區至此接過了省委的職能，將省委、市委的幹部保護起來，安排到軍區下轄部門。而地方軍隊對文革的介入自然導致了造反派的極度不滿，鬥爭的方向也逐漸從省委轉向省軍區。12月23日深夜，為了揪陳偉達與高文泉（省軍區幹部、浙大工作組成員）回浙大接受批判，取得省軍區裏的黑材料，浙大學生第一次衝擊省軍區。龍潛於24和25日帶領數十人到省軍區司令部，否認藏匿陳偉達，要求浙大學生承認錯誤。造反派學生不滿省軍區的表態，後派出代表赴京向中央軍委匯報情況<sup>⑳</sup>。27日，南京軍區政委杜平向林彪報告了浙江情況，林即在下日下午做出了三條指示，稱「不應當由這個問題引起軍隊與革命學生

的對抗，而且應該借這個機會，大力加強軍隊與革命學生的團結」。29日，毛澤東將此文件批發軍營以上各機關，肯定了以上說法。30日，中央軍委答覆學生代表，肯定其「革命行動」，要求省軍區作出檢討<sup>①</sup>。受到中央肯定後，學生即撤出了省軍區，但省軍區與造反派的對立已基本形成，軍隊對造反派的衝擊表示不滿，而造反派則稱「軍隊應該執行中央和中央軍委指示，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折不扣地貫徹十六條」<sup>②</sup>。

## 二 群眾組織與軍隊內部的分裂

造反派第一次衝擊省軍區後沒多久，關於省軍區以及省市委負責人子弟在1966年8月「紅八月」期間打死人的消息在杭州流傳開來。事情緣於紅一司的紅衛兵在抄家時將一位杭州第四中學教師的妻子和岳母活活打死，而紅一司中不乏省軍區的高幹子弟<sup>③</sup>。在市公安局1967年1月12日傳訊無果後，造反派聯同公安人員於13日下午去省軍區找軍區司令員張秀龍要人，張在商談無果後讓副司令員阮賢榜出面與群眾交涉，但阮隨即「發病」，被送往軍區醫院。造反派將情況向中央軍委全軍文革小組匯報，後者很快便肯定了有關行動，要求張做檢查。不過，張並沒有給出讓造反派滿意的答覆，致使造反派於15日下午5時第二次衝擊省軍區，封閉了省軍區司令部大樓。同時，學生感動於阮直面群眾的態度，擔心醫院陷害病中的阮賢榜，遂於同日發起了絕食抗爭。但當時的學生不知道，阮實際上並沒有生病。據軍區醫院副政委8月時揭發，雖然阮在學生面前說「我死也要死到群眾中去」，可他又指示軍隊進駐醫院，加劇了軍隊與群眾的對立<sup>④</sup>。

面對緊張的形勢，周恩來於1月17日凌晨和浙江造反派學生通電話，讓軍隊和省委派代表赴京商談，並表示14日發布的「不得把鬥爭的鋒芒指向解放軍」的通知不適用於這次情況<sup>⑤</sup>。在代表與周恩來商談期間，中央於23日發布了〈支左決定〉，此前遠離地方事務的駐浙野戰軍（陸20軍和空5軍）開始介入支左<sup>⑥</sup>。中央的〈支左決定〉不僅進一步加深了省軍區和造反派之間的矛盾，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浙江軍隊內部（野戰軍與省軍區）的對立。26日，駐杭海空軍攜帶武器舉行遊行，表示「堅決支持革命左派」。同日，省軍區也組織了全副武裝的隊伍遊行，作為對野戰軍的回應。當遊行隊伍回到省軍區門口後，省軍區部隊與留守於此的造反派發生了衝突，打傷二十餘人。一些激進的戰士說：「是左派馬上滾蛋，是右派你們留着！你們等着，我們會用機槍來點你們的名的！」<sup>⑦</sup>據說省軍區一位副參謀長在遊行前聲稱，「我們今天要出出氣，給他〔造反派〕顏色看看」<sup>⑧</sup>。27日，駐浙陸海空三軍代表和省聯總為主的造反派馬上對省軍區的行動進行了回擊，舉行了四萬多人的集會和遊行。造反派還在當日的《浙江日報》將對省軍區和駐浙海空軍的報導放在同一版上，提出口號：「浙江省軍區的一小撮人想幹什麼？！」加配大量「蘇修鎮壓學生」的報導<sup>⑨</sup>。



值得注意的是，造反派在這段時間圍繞幹部政策也產生了分歧。這樣的分化不單因為造反派內部的爭權奪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央領導對省委幹部的態度。1月19日，周恩來與浙江造反派代表團展開了會談，其間，幾位持省聯總觀點的代表團成員提出打倒江華、李豐平、陳冰、陳偉達，結合曹祥仁、賴可可（省委書記處書記）、沈策（省委組織部長）的建議<sup>⑩</sup>。不過，毛澤東在22日於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會議的將領時，提到江華、李豐平等人「要保，都不能打倒」。28日，周接見浙江造反派代表時傳達了毛的意見，肯定了省委在文革前的工作，並說「江華是井岡山革命時期的老同志，是少數民族，主席再三說要保」<sup>⑪</sup>。另據參與會談的成員回憶，周在五次接見期間還點名批評「曹祥仁是個壞人」，如此便否定了造反派的提議，為此後的分裂埋下了伏筆<sup>⑫</sup>。

1月30日，中央發出〈關於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以下簡稱〈浙江十條〉），指出浙江省聯總的鬥爭是「革命行動，中央予以支持」，對於鬥爭被壓制而造成的「惡例」，省委應負全責，省軍區某些領導人負部分責任，並要求犯法同學迅速歸案；省聯總在該決定傳達後撤離省軍區<sup>⑬</sup>。總體來看，發布〈浙江十條〉是一個息事寧人的舉措。雖然中央肯定省聯總的行動，讓阮賢榜回去支持省聯總，但是中央沒有讓省軍區承擔大部分責任，而是讓實際無法正常運作的省委替省軍區承擔全部責任，希望通過省軍區實現大聯合。省聯總等造反派於2月1日撤出省軍區；省軍區副司令員戴克林和空5軍軍長白宗善也在16日表態支持省聯總大聯合，還為省聯總掌管的《浙江日報》和《杭州日報》辦公室增設了武裝崗哨<sup>⑭</sup>。兩報也相繼於20日就此前「所犯的嚴重政治錯誤」表示檢討。23日，中央致信浙江省軍區並轉省聯總，肯定了省軍區的調解，認可了報社的檢討，認為如此便可走向大聯合<sup>⑮</sup>。



在《浙江日報》社外站崗的解放軍戰士（圖片來源：〈解放軍用實際行動支持革命造反派〉，《浙江日報》，1967年2月17日，第2版。）

不過，政治形勢實際上沒有朝着有利的方向發展。省軍區從一開始便對中央派來解決問題的杜平施加壓力，縱容戰士衝擊杜平，使杜平不得不住入陸20軍駐地<sup>⑯</sup>。另一方面，群眾組織間也圍繞江華問題出現了分裂，在北京會談的浙大學生認為不能打倒江華，於1月29日成立了浙大「暴動總部」（後改稱「紅暴會」），從有五十多個組織、隸屬省聯總的「浙大紅色造反聯絡站」（浙大紅聯站）脫退。2月4日，浙大暴動總部負責人到省軍區會見阮賢榜，在商討取得一致意見後，於省軍區打電話組織力量，衝擊了省聯總商討奪權的會議<sup>⑰</sup>。12日，紅暴會發動突襲，衝擊了省聯總召開的鬥爭江華大會（江華已於

前一晚由軍隊和省聯總成員送往北京)，並傳達周恩來在1月會談時「保江華」的指示，造反派內部兩派正式分道揚鑣<sup>③</sup>。2月13日，原先的保守派組織也開始抬頭，與紅暴會聯合成立了「浙江省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總指揮部」（無聯總），於20日深夜對《浙江日報》展開反奪權。省軍區此前就與《浙江日報》有過節，對此無動於衷，省軍區獨立2師政委李克還親自去觀察動靜，坐吉普車去《浙江日報》辦公室，尋找被造反派揪走的省委副秘書長薛駒<sup>④</sup>。

無聯總的行動並不讓人困惑，但是此前衝擊軍區最激進的浙大造反派學生，這時卻開始要結合江華等省委幹部，與省軍區之間形成密切的聯繫。合理的推測是，由於赴京參加會談的多是浙大學生（省聯總負責人張永生、賀賢春、杜英信等人並沒有參加會談），他們在學校裏有較強的號召力，在周恩來的再三疏通下改變觀點，遂號召相當一部分學生參與自己的陣營。儘管浙大學生一度衝擊了軍區，提出的口號也相當激進，但是紅暴會「保江華」的做法與省軍區的想法達成一致，獲得了省軍區的庇護與支持。兩派的對立此時已相當明朗：一邊是與陸20軍、空5軍有密切關係的省聯總，一邊是與省軍區有密切關係的紅暴會。

### 三 軍管前後的鎮壓與對抗

由於各方圍繞幹部政策爭論不休，紅暴會認為省聯總「保曹〔祥仁〕反江〔華〕」，而省聯總則認為紅暴會「保江反曹」，浙江在中央發出〈浙江十條〉後並沒有實現大聯合。為調解兩派分歧，周恩來在1967年3月6日再次接見了浙江的造反派代表團。這次的代表團與1月的代表團成員完全不同，除滕鑄是紅暴會成員外，其餘參與者基本都是持省聯總觀點的。周在講話中再次點名批評了曹祥仁、陳偉達、陳冰，以及溫州地委書記王芳，否決了省聯總要結合浙江省委馮白駒的提議；但在「保江華」的問題上，周相對於1月時的表態，言辭中有所保留。周表示自己根本沒有說「主席再三要保」江華，對要「保江反曹」的話概不負責，鬥爭江華是群眾的事，不要去干涉，更不要拿他和主席的名義去干涉<sup>⑤</sup>。與造反派商談過後，周又在3月8日接見龍潛，提出要浙江拿出建立革委會籌備小組或軍事管制的方案。龍潛隨後便與江華匯報情況，江華又與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討論，認為只有軍管才能穩定局勢，讓龍潛回去立即執行軍管，並將意見上報中央。15日，中央決定對浙江實施軍管。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以下簡稱「省軍管會」）成立，省軍區政委龍潛任主任，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舟嵎要塞區政委曹思明、陸20軍政委南萍、空5軍政委陳勵耘任副主任<sup>⑥</sup>。

從省軍管會的組成不難看出，其內部顯然存在嚴重的分歧。在省軍管會正式成立之前，省軍區就開始接管省軍管會內部一些重要部門，並陸續使用武力對一些省聯總成員進行選擇性的彈壓。3月17日，龍潛主持會議，省軍區黨委審批了抓捕名單，兩日後省軍區即派處長5人、機關幹部7人、手槍戰士6名，抓捕8位省聯總成員。陸20軍和空5軍則於25日到浙大與省聯總學生聯

歡，表態支持省聯總<sup>42</sup>。在組織層面，省軍區佔據了省軍管會內部從組、辦公室到革命、生產兩大委員會的正職幹部，並且把原軍區部分組織撤銷，抽調人手去省軍管會，以掌握省軍管會的控制權。為了削弱陸20軍和空5軍對外部的影響，省軍區還派人員外出軍訓<sup>43</sup>。當然，很難說陸20軍和空5軍就沒有爭奪權力，陳勵耘曾向中央軍委吳法憲寫信告省軍區的狀，吳授意陳「驅龍（潛）扶南（萍）」<sup>44</sup>。陳隨後向南萍透露內部消息，並縱容了造反派對省軍區的批判。

4月，政治形勢出現了重大改變，主張釋放被捕造反派成員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軍委十條〉）和〈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中央五條〉）相繼下發，此前受到省軍區打壓的省聯總重新得勢。先是紅暴會在4月2日召開了批判曹祥仁、賴可可、沈策的大會，省聯總隨即在5日展開反擊，組織十五萬人開大會，把矛頭對準江華。在矛盾激化之際，兩派指揮行動的各式組織相繼成立，省聯總在3月底成立了飛虎隊、西湖縱隊等武鬥組織；紅暴會在5月上旬也組織了「浙江省紅暴派臨時指揮部」（紅暴派），從浙大擴展為省級的指揮機構。雖然一些當事人稱這些組織與自己並無關係<sup>45</sup>，但是此時借武鬥之名進行毆鬥的現象層出不窮。

5月10日，杭州運輸業的群眾組織與紅暴會聯繫，搶了七十六輛客貨車，組織人手北上告狀。據稱，龍潛為支援紅暴會北上，還派人來送行，批給紅暴會十噸汽油<sup>46</sup>。23日，浙江農業大學的「革命造反總部」（革造總，隸屬省聯總）和「紅色造反委員會」（紅造會，隸屬紅暴派）發生大規模武鬥，紅造會搶砸了革造總的電話總機，砸翻軍車，搶走了南萍的公事包和皮箱，並送到省軍區。省軍區隨後將搶來的陸20軍的材料分批送司令部加以複製。龍潛更指示成立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負責的「支左辦公室」，向「中央、南京、〔張〕春橋同志」上報「社會動態」，直接針對支左的野戰軍<sup>47</sup>。革造總和杭州市公安局造反派隨後到省軍管會向龍潛發起了靜坐示威，省聯總的緊急聲明更改變3月調停後對省軍區退讓的態度，直接點名龍潛，把省委問題視為軍隊問題<sup>48</sup>。這一表態在5月以前是難以想像的。

軍隊和群眾內部的分裂導致武鬥在5月以後進一步升級。5月30日晨，省聯總等造反派和駐浙部隊指戰員二十五萬人舉行集會和遊行，下午的控訴大會更提出了「打倒拿槍的劉鄧路線」的口號，針對省軍區的領導幹部。6月1日，龍潛在省軍管會黨委擴大會議上將問題指向空5軍，批評「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是造反派提的，是空5軍提的」<sup>49</sup>。4日凌晨，紅暴派劫走了由省軍管會安排在愛國飯店揭發省委的賴可可、陳冰、沈策。省聯總懷疑他們被轉移到紅暴派控制的杭絲聯，便派出作戰部長郭志松前往偵查，但被紅暴派發現並抓捕。為此，省聯總召開緊急會議商量對策，部分人提出請龍潛出面調停，但張永生等主張調停失敗便訴諸武力解決。5日，省聯總組織人手，頭戴藤盔、手持鐵棍衝入浙大，毆打了紅暴派成員，又於當日包圍了杭絲聯；6日，省聯總進攻了杭絲聯，挑起了杭州大規模武鬥的先例<sup>50</sup>。

武鬥發生前，不管是省軍區還是空5軍、陸20軍的幹部都知悉有關行動，但是沒有人出面制止。例如，省聯總內部召開緊急會議時表現出的主戰態度，

陸20軍駐省聯總的代表是清楚的，其部派往省聯總的師副參謀長周文江還和張永生等一起行動，參與指揮；武鬥後被俘虜的紅暴派成員也皆由陸20軍接走<sup>⑤</sup>。而省軍區司令部黨委於6月6日事發後便召開會議討論支持紅暴派的方法，在8日下午省軍管會開會前，省軍區還先在上半日召開了內部會議，提出一個抓人（包含張永生和周文江等人）的方案<sup>⑥</sup>。這一方案對於野戰軍和省聯總來說顯然是不容接受的，矛盾貫穿了事件的始終。

雖然中央在6月6日發布了制止武鬥的通令，周恩來也在當日指示省軍管會派人把兩派隔開<sup>⑦</sup>，但從軍隊的處理方式上看，這樣的指示有些一廂情願。省軍管會中省軍區和野戰軍的代表本身便矛盾重重，並極深地參與到武鬥的策劃中，制止武鬥幾乎是不可能的。7日，大量農民坐着十七輛卡車開過錢江大橋準備進城參與武鬥，與大橋上的省聯總成員發生衝突，出現城內第一例死亡。10日，拱宸橋附近再次發生農民參與的武鬥，一些杭三司（隸屬省聯總）的學生被打傷<sup>⑧</sup>。農民本身不太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知道城中武鬥的事，並調動數輛卡車進城，可見這些行動是由省軍區和紅暴派參與組織的。如農民進城時，省軍區三連連長即接到張秀龍兩個電話，命令部隊抓捕兇手。省軍區副司令員何以祥在10日事發後更是說：「好嘛！農民起來好嘛！你有十六條，他有十七條（指一條扁擔）。省聯總就是怕農民，革命沒有農民運動不行。」<sup>⑨</sup>雖然省聯總也是武鬥的積極主張者，但是文革後的材料對此時省聯總的行動欠缺記錄。

在得知省聯總和紅暴派再次發生武鬥的情況後，毛澤東於6月10日決定「要解決一下問題」。周恩來於11日指示浙江軍隊、省聯總、紅暴派上京會談，13日接見了來京代表<sup>⑩</sup>。龍潛會在會談中匯報了假消息，稱南萍、陳勵耘等挑起武鬥，鎮壓群眾，翁森鶴一家「死的死，傷的傷」。南萍馬上糾正龍潛的提法，說翁在省聯總保護下安然無恙<sup>⑪</sup>。周在會談中指責龍潛匯報不實消息，還批評了紅暴會5月搶車上訪和搶奪幹部的做法是不對的。周恩來、張春橋等人在此次會談後又與雙方代表展開了數次談話，省軍區的支左路線被中央徹底否定<sup>⑫</sup>。中央對省軍區的態度轉向或許並不完全因為龍潛的假消息，更多可能是由於大聯合中的幹部問題。「二月逆流」後，中央很難再信任與發動抗爭的譚震林有諸多關係的江華<sup>⑬</sup>，所以省軍區的支左路線需要被否定。同時也由於中央各個領導的疏導，紅暴派的主要成員翁森鶴的態度出現了轉變，開始轉向支持省聯總。

省軍區的談判代表隨後開始檢討錯誤。6月17日，龍潛在北京做了第一次檢討；7月5日，何以祥代表省軍區黨委在「向部隊支左工作提意見會議」上第一次公開承認「立場、方向、路線錯誤」；16日，龍潛代表軍區黨委再次做了書面檢討，承認路線錯誤<sup>⑭</sup>。代表最終於19日達成協議，於22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協議共十二條，其核心在於「消除一切武鬥因素」<sup>⑮</sup>。同日，省聯總和紅暴派代表在北京也簽署了協議，同意「把鬥爭矛頭指向江華、李豐平、曹祥仁」，指出「以龍潛為首的浙江軍區黨委在支左過程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欺上瞞下，對抗中央指示，壓制、鎮壓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兩派求同存異，「逐步實現以省聯總為核心的更廣泛的革命大聯合」<sup>⑯</sup>。



## 四 野戰軍主導下的支左

事實上，檢討並不意味着此前的事情能夠一筆勾銷。龍潛等在7月回到杭州後馬上就遭到鬥爭，省軍區內又相繼成立造反兵團，不斷揪鬥省軍區領導幹部，8月26日的交權大會更讓軍區領導跪在台上，搞「噴氣式」<sup>⑬</sup>。對中央的處理方式，省軍區內部一些指戰員出現了很大的消極情緒。副司令員劉亨雲於7月15日即說：「以後我們不要單獨支持，凡是省聯總、空5軍支持的，我們也支持，不管對和錯，我們支持好了。錯了大家都錯，大家分擔一些，方向路線錯誤就弄不到我們頭上了。」8月19日，一位軍區副司令員甚至以個人名義電報中央，要求野戰軍迅速接管省軍區<sup>⑭</sup>。而在省軍區的下轄部隊中，獨立2師的情緒波動最大，其部政委李克在12日飲彈自盡未遂，後被獨立2師黨委開除黨籍、軍籍<sup>⑮</sup>。在8月宣布改組省軍區的大會上，陸20軍更對獨立2師實行了武裝警戒，造成該師不滿。在9月宣布獨立2師換防、整訓的會議上，師、團級幹部在宣讀完命令後的數分鐘裏沒有一人表態，直到造反派組織者指出「沉默是對中央的態度問題」，幹部才開始發言。而戰士層面的情緒波動更大，有的不值崗，有的逛大街，有的說堅決不離開杭州<sup>⑯</sup>。

《浙江「文革」紀事(1966.5-1976.10)》一書指責了陸20軍和空5軍的領導對獨立2師的處理方法。該書認為南萍、陳勵耘歪曲了周恩來在電話中的指示，非但沒有去說服獨立2師，反而去召開會議籌措所屬部隊開展「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sup>⑰</sup>。事實上，根據造反派放出的林彪和周恩來的指示內容，「浙江省軍區司、政、後、文工團直屬機關、學校可以搞『四大』，軍以下部隊他們有權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送大字報、小字報，可以進行討論，獨立2師，他們的領導人自己不好，有錯誤，激起部隊的反感，可以允許他們用三大民主的方法，進行揭發批判，鬥爭」<sup>⑱</sup>。而當日在上海的毛澤東也說：「我們的軍隊，野戰軍好，陸、空、海軍好。有些地方軍好，有些不好」，「每個省都有兩派勢力」，「有些地方還要亂一些時候，亂是好事」，「如果沒有大亂，矛盾就不能暴露」<sup>⑲</sup>。周確實說了要關門開展「四大」，注意手段，但是他也十分嚴厲地批評了獨立2師，而毛更直接指出「有些地方軍……不好」，「亂是好事」。陸20軍和空5軍的領導在縱容造反派揪鬥省軍區領導和開展「四大」的問題上的確存在一些手段不妥的問題，但主要還是根據中央指示，而「四大」的工作是省軍區的龍潛和阮賢榜等人負責的<sup>⑳</sup>，他們可能對此消極應對。更加重要的是，這樣的處理方式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是「上有所好」。

同時，陸20軍和空5軍皆有部隊駐扎杭州附近，儘管省軍區一些下轄部隊產生了消極情緒，但是中心城市內並沒有發生太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與駐扎在杭州的部隊比較，下屬地縣的軍分區和人民武裝部(人武部)更加獨立，在7月初北京調停期間就已經開始使用武力解決問題，其時間早於武漢「七·二〇」事件和江青隨後提出的「文攻武衛」口號。如溫州地區的「瑞安縣聯站」(瑞聯站；人武部支持，後為紅暴派組織)早於7月5日就已對瑞安縣城區內的「瑞安縣聯總」(瑞聯總；持省聯總觀點，後獲野戰軍支持)進行包圍，展開長達102天的圍城。而「溫聯總」(溫州軍分區支持，後為紅暴派組織)也於20日

在溫州市內的附屬醫院動用機槍、手雷、炸藥包等武器進行武鬥；25日更對城內的「工總司」（持省聯總觀點，後獲野戰軍支持）發起全面進攻<sup>①</sup>。29日，前往溫州調停的阮賢榜要求溫聯總先放下武器，但遭到了軍分區的否定。8月3日，金華縣的「金工總」（人武部支持，後為紅暴派組織）還攔截了省軍管會派往青田縣的調查組，殺害了調查組內的省聯總成員蔡壽山，打傷了其餘四位省軍管會成員<sup>②</sup>。

為此，由野戰軍主導並已改變觀點的省軍管會採取的手段是「用武鬥解決武鬥」，首先是「武裝左派」。在7月下旬的一個會議上，南萍、陳勵耘就指示造反派要想辦法取得武器，陸20軍首長熊應堂還表示「民兵使用的武器是省軍區管的嘛」，點出原省軍區高幹對地方紅暴派的支持。根據文革後的揭發材料，8月5日和7日，張永生等一千餘人先後衝擊了省軍區軍械二庫和軍械一庫，搶走手槍、信號槍、衝鋒槍、步騎槍、輕機槍、重機槍、高射機槍、迫擊炮、無坐力炮、火焰噴射器、手榴彈等武器若干，以及幾車的各式彈藥<sup>③</sup>。不過，筆者對官方材料上的搶槍一說抱有疑問。據一位8月中下旬上訪杭州的瑞聯總成員回憶，他們經省聯總的引薦面見了省軍區司令員張秀龍，張相當客氣地接待了他們，並當即讓人打電話指示省軍區下屬某營給瑞聯總以支持（約五輛軍車的武裝物資），「槍是名正言順部隊給我的」<sup>④</sup>。經過中央的開導，省軍管會內部的態度此時應該是一致的，並無人對中央的指示提出異議，甚至原來對造反派抱有怨氣的張秀龍這時也開始支持省聯總的組織。

然而，軍隊領導的態度轉變卻直接加劇了武鬥的烈度。除「武裝左派」以外，為解決下屬地縣的武鬥問題，省軍管會採取了相當直接的介入手段。省軍區獨立1師第3團（6517部隊）和陸20軍60師步兵第179團（6299部隊）先後於8月1日和9日進駐溫州，部隊在進駐過程中與溫州軍分區支持的溫聯總發生武裝衝突，部隊與群眾皆出現傷亡<sup>⑤</sup>。進駐部隊其後於11日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溫州支左聯合指揮部」，由6297部隊、6299部隊、6541部隊、



溫州工總司「火線指揮部」武裝人員合影（圖片來源：溫州鹿城農村合作銀行、中共溫州市鹿城區委人才辦編：《溫州老照片》〔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7〕，頁80。）

6515 部隊、6517 部隊聯合組成，計兩個師共三個團的兵力，於 13 日幫助工總司解開溫聯總的包圍<sup>⑤</sup>。22 日，中央宣布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省軍區，肯定了野戰軍的行動。南萍任省軍管會主任、省軍區代政治委員，熊應堂為省軍區代司令員，以陸 20 軍為主組成新的軍事領導機關進駐杭州，統一指揮浙江軍隊<sup>⑥</sup>。

在省軍管會和省軍區改組後，軍隊進一步對地縣的紅暴派組織進行圍剿。8 月 24 日，在某部副團長與造反派負責人共同籌劃下，部隊和省聯總組織圍剿了富陽縣另一派群眾組織，有 135 名幹部、職工和農民被打死，7,600 餘人被吊打關押在「集中營」，319 人被打成殘疾<sup>⑦</sup>。兩日後，省聯總屬下三四千名經過軍訓的造反派成員分三路攻打蕭山縣，陸 20 軍的周文江任總指揮，張永生等任副總指揮，共九十多人死亡。9 月 7 日，陸 20 軍軍長批示進駐溫州支左聯合指揮部的報告，下令用一個營的兵力向鯉魚山攻擊，圍剿市郊溫聯總組織，造成流血事件<sup>⑧</sup>。13 日，在向中央軍委和南京軍區上報行動方案後，陸 20 軍 58 師第 172 團與兄弟部隊共四個營的兵力，協同接受過軍訓的諸暨縣造反派一起進攻，圍剿了諸暨的另一派組織，「制止」了武鬥，計 146 人被打死<sup>⑨</sup>。

文革後的清查材料提及：「據全省不完全統計，從 1967 年 7 月到 1968 年底，發放槍炮 51,000 件，炮彈 2,600 餘發，手榴彈 88,000 多枚，槍彈 560 餘萬發」，「全省有 21 個縣（市）被『武裝解放』」，「全省武鬥中死亡的幹部、群眾達 2,900 多人，其中被殺害的『俘虜』731 名，不少親屬受到牽連」<sup>⑩</sup>。但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南萍等人的支左方式也並非自作主張，他們的行動受到了中央的肯定。在進駐溫州的問題上，毛澤東於 8 月 8 日對支左部隊做了三點指示，周恩來便於當日提議 6299 部隊進駐溫州，並獲得了毛澤東、林彪的批准。毛隨後又做了四點指示，讓 6299 部隊幫助 6517 部隊進行「軍事隔離」。12 日林、周下達指示，稱要「盡快徹底平息溫州叛亂」<sup>⑪</sup>。既然是鎮壓叛亂，出現武鬥又談何奇怪？8、9 月間的蕭山、諸暨武鬥事件也是同理。況且，進攻蕭山、諸暨是為了打通鐵路線，讓當時正在視察大江南北的毛的專列可以順利沿贛浙線北上，南京軍區為此還指派了一個加強排參與行動<sup>⑫</sup>。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解放軍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中央的命令。

## 五 為革委會成立作準備

由於 1967 年 7、8 月間全國範圍激烈的武鬥，毛澤東開始批評紅衛兵，團結幹部，並隔離審查中央文革小組的領軍人物王力、關鋒、戚本禹。隨着政治風向轉變，杭州市內的武鬥在 10 月以後也逐漸減少，報刊上開始宣傳大批判、鬥私批修、解放幹部等內容，促進大聯合。9 月 9 日，毛在提到龍濟等人問題的同時還批評了造反派的「小將」們，他說：「要告訴造反派的頭頭，現在正是他們犯錯誤的時候。」16 日，他到杭州後又和南萍、陳勵耘說：「你們對省委、地委的幹部要慎重」，「紅衛兵對幹部一風吹不好。現在紅衛兵把團結——批判——團結搞亂了，破壞了」<sup>⑬</sup>。10 月 26 日，省聯總在人民大會堂

召開了「解放沈策大會」，原省委組織部長沈策成為第一個重新亮相的省委常委。11月1日，原省委常委、書記處書記賴可可也在大會上亮相，成為第二位被解放的省委常委<sup>⑤</sup>。二人隨後都被結合進次年3月成立的革委會內，而江華、李豐平、曹祥仁等則沒有出現在名單內。

11月16日，在省軍管會討論革命大聯合問題時，南萍與陳勵耘在「紅暴」問題上發生分歧。南萍認為紅暴會等組織都是犯了錯誤的老造反派，應該團結聯合起來，不能採取分化瓦解的辦法。而陳勵耘則認為他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不能和他們聯合。這則消息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11月編印的《快報》上登出，經姚文元批註同意南萍的意見上報後，毛澤東於22日批示：「浙江的紅暴，與湖北的百萬雄師〔武漢群眾組織〕不同，是個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有許多群眾，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見，以幫助，批評，聯合為原則。」此批示後於12月2日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題為〈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並指出對老造反派「在革命『三結合』領導機構中保留他們一定的名額」<sup>⑥</sup>，旨在實現大聯合。

然而，這樣的大聯合實際上並不存在。省軍管會、省聯總在傳達〈通知〉時解釋說，毛澤東講的是紅暴派中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但紅暴派大多數不是老造反派，而是「保皇派」，不能團結聯合；與此同時，溫聯總等盤踞山野的地縣組織也在10到12月間不斷和部隊與群眾組織發生交火<sup>⑦</sup>。雖然〈通知〉的精神在於實現大聯合，但在矛盾無法平息的情況下，支左部隊仍然對浙南的武裝組織展開了圍剿，造成大量的人員損傷與經濟損失。舉例而言，12月6、7日，6515、6517等部隊和瑞聯總先後對瑞安的陶山和交背山的瑞聯站武裝發起了進攻，6541部隊師長還為此制訂了三面夾攻的圍剿計劃<sup>⑧</sup>。據在陶山的瑞聯站成員回憶：「上山的有穿軍裝的也有不穿軍裝的，我們拿長槍，部隊拿半自動，打部隊根本吃不消」；另一位在交背山的瑞聯站成員也表示，雖然在交背山附近駐有140餘人的武裝隊伍，備有30來挺輕重機槍、1挺高射機槍，還配有炮，但因想不到部隊配合全面包剿，待部隊和瑞聯總打下來時，才發現還擊乏力，戰場的情況異常慘烈<sup>⑨</sup>。行動過後，28日省軍管會再次改組溫州區軍管會，支左部隊的首長成為新軍管會的主要人物，並在次年成立的地、市革委會內擔任要職。軍隊的行動顯然沒有被譴責，反而受到了中央肯定<sup>⑩</sup>。

1968年1月8日，兩派代表赴京接受調停，籌備建立浙江省革委會，周恩來、楊成武、姚文元等多次接見談話，最後於2月22日達成協議，再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sup>⑪</sup>。兩派的武裝衝突此後有過一段短暫的緩和時期，但是浙江各地區的武鬥問題並未徹底解決。許多地縣的武裝成員仍滯留在外進行「游擊戰爭」，紅暴派也沒有遵照中央的要求與浙江省下屬地縣的保守派組織脫鉤，而是成立了「浙江省地、縣聯合指揮部」。其後，武鬥藉着1968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勢頭出現又一個高潮<sup>⑫</sup>。雖然這和群眾組織之間內部的鬥爭有關，但其主因在於一些中央領導的曖昧態度。如周恩來在接見浙江代表時多次點名持省聯總觀點的王芳是壞人，「溫聯總有點百萬雄師的樣子」。楊成武在接見代表時也說：「紅暴不等於沒有壞人，當然是少數，浙江是很複雜的



地方，如溫州不可能沒有美蔣特務。」<sup>③</sup>既然連中央首長都如是說，省聯總傳達中央意見時怎麼能不出現偏差，而對立組織又怎麼能輕易繳械投降？

## 六 結論

從本文的討論可見，文革初期至少在浙江省，解放軍的介入並沒有促成群眾組織之間的「大聯合」，反而造成了群眾與軍隊自身的「大分裂」。省軍區是最早介入文革的軍隊勢力，雖然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省委幹部，讓政權機器能夠正常運作，但卻加劇了群眾與軍隊的對立，尤其是造反派與省軍區的對立。同時，由於紅一司等保守派組織的部分高幹子弟在文革前期的暴力行為，以及他們和省軍區的密切聯繫，進一步加深了省軍區與造反派的對立，造成了兩次衝擊軍區事件。

省軍區後與造反派赴京接受調停，但結果是造成更嚴重的分裂。首先是軍隊內部的分裂，促成野戰軍的介入，雙方與各自支持的群眾組織進行遊行。其次是群眾內部的分裂，部分浙大造反派學生（後為紅暴派）遵循周恩來的意思去「保江反曹」，並與省軍區達成一致，但由於許多學生反對，因而形成兩派。這樣的派性分野恐怕和文革前的衝突並無太多關係，其核心的分裂原因在於中央指示和軍隊介入。而從紅暴派轉向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出，群眾組織和軍隊間的聯合並非意識形態上的結合，紅暴派曾是衝擊軍區最激進的群體，但卻在中央發出指示後迅速轉向。儘管提的口號是極左的「全省大亂」<sup>④</sup>，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獲得省軍區的支持，因為雙方在幹部政策上有共識。把文革描繪成意識形態層面的鬥爭，至少在浙江的案例上不一定能說通。

在政治形勢進一步混亂下，中央以及浙江的省委、軍隊幹部決定對浙江實行軍管。軍管前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秩序，但省軍區主導的軍管打擊了很多造反派，省軍管會內部也存在着省軍區與野戰軍的鬥爭。在中央游移不定的指示下，造反派陸續被解放，雙方矛盾逐漸變得難以收場，出現有組織的武鬥，而且一次比一次規模大。野戰軍和省軍區都參與策劃了武鬥，雖然兩派在北京談判時中央已經要求制止武鬥，但是雙方都沒有遵循。

談判最終以省軍區承認路線錯誤結束，支左的主導權開始由野戰軍主導。地方軍隊為此產生了極強的消極情緒，野戰軍的應對是「用武鬥解決武鬥」，調動大量部隊進駐浙江省下屬縣市，與地方軍事勢力發生直接衝突。中央全程主導了行動，於溫州武裝衝突後改組了省軍區和省軍管會，肯定了野戰軍的行動，並繼續對周邊地縣展開清剿。隨着1967年10月後武鬥減少，毛澤東開始推動大聯合，但是支左部隊依然對地縣群眾的武裝組織展開圍剿，且部隊首長反而成為了當地的軍政領袖。事實上，在浙江邊緣地縣的武鬥從未停止<sup>⑤</sup>。

本文認為，從浙江的案例來看，軍隊根據中央指示介入是爆發武鬥最主要的導火索，和「前十七年」（1949-1966）的體制性矛盾並無太大聯繫。省委在文革前期就已無法正常運作，軍隊必須接管省委，讓軍隊介入文革可說是自

然而然的結果。此外，浙江的支左進程是在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直接過問的情況下進行的，中央文革小組在前期很大程度上是缺位的。儘管張春橋初期對一些問題發過言，但是他的指示遠沒有周恩來的指示來得具體、有力<sup>⑩</sup>。最重要的是，中央從1967年8月就開始動用軍隊鎮壓，往後不斷進行追剿。革委會的成立並不單單源於在北京的談判，動用軍隊力量自始至終都是中共控制運動的主要手段<sup>⑪</sup>。

### 註釋

① 〈中共中央對浙江舟山地區問題的批示（概要）〉（1970年3月18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

② 參見余汝信：《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21），頁596-609。余並未注意到，野戰軍主導浙江省軍區改組和省革委會成立後，地方的武裝勢力依然很強大。參見杭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編：《浙江「文革」紀事（1966.5-1976.10）》（杭州：《浙江方志》編輯部，1989），頁107。

③ Keith Forster, *Rebellion and Factionalism in a Chinese Province: Zhejiang 1966-1976*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0).

④ Dong Guoqiang and Andrew G. Walder, "Forces of Disorder: The Army in Xuzhou's Factional Warfare, 1967-1969", *Modern China* 44, no. 2 (2018): 139-69.

⑤ Andrew G. Walder, "Anatomy of a Regional Civil War: Guangxi, China, 1967-1968", *Social Science History* 46, no. 1 (2022): 35-63.

⑥ Andrew G. Walder, "Anatomy of a Regional Civil War: Guangxi, 1967-1968", LRCCS Noon Lecture Series, Zoom Conference, 8 November 2022. 但這一觀點存在爭議，如有學者認為韋國清能夠成為「政治不倒翁」是因為揣摩上意，而不是越戰。參見秦暉：〈「否定」並未徹底 「真相」仍待揭示——從文革中的清華與廣西談起〉，載孫怒濤主編：《歷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上冊（香港：中國文化傳媒出版社，2015），頁25-29。

⑦ 〈不折不扣地按黨的政策辦事〉，《人民日報》，1967年7月13日，第3版。

⑧ 1968到1969年軍事圍剿包括的地縣有平陽、泰順、龍泉、樂清、麗水等，在此不展開討論。

⑨ 〈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人民日報》，1967年4月25日，第2版。

⑩ 有趣的是，不管是文革中還是文革後，各方都在嘗試淡化軍隊的真實作用：獲得軍隊支持的造反派稱他們和部隊僅僅上山「宣傳毛澤東思想」，就被對立派無端殺害。參見溫州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編寫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浙江溫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7年1月-1967年12月》（出版資料不詳，1969），「12月」，頁2。

⑪ 〈揭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劉丹的反動面目〉，《浙江日報》，1966年6月24日，第1版。

⑫⑬⑭⑮⑯ 《浙江「文革」紀事》，頁3；26-27、29；49；58-68；70。

⑬ 陳安羽：〈在「控告揭發前浙大工作組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及其流毒大會」上作第三次檢討〉，《紅衛兵報》（浙江大學），1966年12月20日，第6、7版。

⑭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670；包文樸：《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香港：香港出版社，2014），頁34。

⑮ 浙江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總部政宣組：〈徹底清算江、李、「二龍」互相勾結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1967年9月5日）、梁毅等：〈揭發〉（1967年8月

11日)，載浙江省級機關黨群系統革命造反聯絡部編：《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出版資料不詳，1967），頁3、25。

⑮ 杭州市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宣言〉，《紅衛兵報》（杭三司），1966年11月15日，第2版；《浙江「文革」紀事》，頁18；王力、姚文元：〈對杭州絲綢廠兩千多來京職工的講話〉（1966年11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⑯ 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誓死保衛毛主席》戰鬥大隊：〈李豐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死的罪行〉，《紅色風暴》，1967年4月16日，第2版；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672-73。

⑰ 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等：〈告全省人民書〉（傳單原件，1966年12月30日）。

⑱⑲ 《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19；329。

⑳ 浙江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總部政宣組：〈徹底清算江、李、「二龍」互相勾結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滔天罪行〉，頁3；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載《歷史拒絕遺忘》，下冊，頁902。

㉑ 〈中共中央轉發毛主席、林副主席關於浙江問題的重要指示〉（1966年12月2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頁902。

㉒ 〈浙江大學等校革命造反派大鬧省軍區司令部〉，《紅衛兵報》（杭三司），1966年12月29日，第2版。

㉓ 參見杭一中革命造反總部：〈駭人聽聞的白色恐怖〉（1967年1月6日）、錢福成：〈血的控訴〉（1967年1月10日），杭州市文教系統痛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處翻印，無頁碼。

㉔ 參見趙熙文：〈揭發〉（1967年8月9日），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33-38。當時絕食的學生並不知道阮賢榜叫軍隊來，但是都和軍隊發生了衝突。參見首都三司駐杭聯絡站等：〈我們戰鬥在一一七醫院〉，《紅色造反者》，1967年1月25日，第1版。

㉕ 周恩來：〈和浙江省革命造反派通話紀要〉（1967年1月17日），《紅色風暴》，1967年1月18日，第1、2版。

㉖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1967年1月23日），載編者不詳：《中共中央文件彙編：1966.5-1968.5》（內部資料，1968），頁69-71。

㉗ 〈人民解放軍和革命造反派實行大聯合大團結相互支持並肩戰鬥向一小撮壞蛋發起總進攻〉，《浙江日報》，1967年1月28日，第2版。

㉘ 司令部《批資部》東風兵團：〈揭發〉（1967年8月12日），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6。

㉙ 〈駐杭空軍部隊昨日舉行示威遊行〉、〈駐杭海軍部隊昨日舉行示威遊行〉、〈省軍區一小撮人鎮壓革命群眾罪責難逃〉、〈浙江省軍區的一小撮人想幹什麼？！〉，《浙江日報》，1967年1月27日，第2版。

㉚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6-3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19。

㉛ 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頁907、922；徐水良：〈浙江文革的一樁公案——海外雜憶（三）〉（2007年2月11日），徐水良提供。

㉜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浙江最近發生事件的決定〉（1967年1月30日），載《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頁78-79。

㉝ 白宗善：〈在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集會上的講話〉、戴克林：〈在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集會上的講話〉、〈解放軍用實際行動支持革命造反派〉，《浙江日報》，1967年2月17日，第2、3版。

- ⑤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給浙江省軍區並轉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的信（1967年2月2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⑥⑥ 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頁909；942-43。
- ⑦ 包文樸：《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67；浙江省省級機關黨群系統革命造反聯絡部等：《李豐平二月黑「檢查」出籠大事記》（出版資料不詳，1967），頁3。
- ⑧ 江華赴京時間，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26；衝擊現場情況，參見徐水良：〈浙江文革的一樁公案〉。
- ⑨ 《浙江「文革」紀事》，頁32、34；六三八九部隊戰士：〈揭發〉（1967年8月17日）、徐存溪：〈揭發〉（1967年8月20日），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9。
- ⑩ 周恩來：〈接見浙江省代表團的談話紀要〉（1967年3月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⑪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當代浙江研究所編：《當代浙江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243；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686。
- ⑫ 〈簡訊〉，《紅色風暴》，1967年3月27日，第2版。
- ⑬ 參見〈龍潛的反革命戰略〉，《立新功》（省軍區造反派），1967年9月10日，第3版；浙軍司「八六」造反團：〈揭發〉（1967年8月11日）、軍訓辦公室部分革命同志：〈揭發〉（1967年8月9日），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9-10、26。
- ⑭⑯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686；692-93、710-11。
- ⑮ 中共浙江省委清查王張江姚材料組：《「四人幫」在浙江的親信、現行反革命份子張永生的罪證材料》（出版資料不詳，1978），頁37-38；《浙江「文革」紀事》，頁42、45。
- ⑯ 〈杭絲聯五·九事件調查報告〉、〈迎着困難上！——記杭州運輸段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產」的事跡〉，《紅色風暴》，1967年5月19日，第1-2、3版；包文樸：《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10。
- ⑰ 胡伯英、省軍區政治部《狂飆》造反大隊：〈砸爛省軍區黨委內的黑線〉（1967年8月11日），《紅色風暴》，1967年8月20日，第4版。
- ⑱ 浙江省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關於農大紅造會挑起大規模武鬥製造流血慘案緊急聲明〉，《紅色風暴》，1967年5月27日，第1版；《浙江「文革」紀事》，頁45。
- ⑲ 〈省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駐浙陸海空三軍指戰員二十五萬人舉行空前盛大的集會和遊行〉、〈省市二十萬革命造反派憤怒舉行控訴大會〉，《紅色風暴》，1967年6月2日，第1、4版；烈火赤衛隊：〈堅決揪出龍潛的黑後台〉，《革命造反報》（浙江大學），1967年8月22日，第1版。
- ⑳ 〈紅暴派挑起杭絲聯「六·五」事件罪責難逃〉，《紅色風暴》，1966年6月11日，第4版；上海體育學院：〈我們目睹的杭絲聯「六六」慘案〉，《戰杭城》，1967年6月27日，第3版。
- ㉑ 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頁938；《浙江「文革」紀事》，頁47-48。
- ㉒ 李寶枋：〈揭發〉（1967年8月11日）、政治部黨委秘書朱綱：〈揭發〉，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22、12。
- ㉓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60。
- ㉔ 〈省市無產階級革命派二十餘萬人召開熱烈歡呼六·六通令發表大會〉，《紅色風暴》，1967年6月11日，第1版；盛言、駱恒光：〈向光榮負傷的紅三司戰士致敬〉，《紅衛兵報》（杭三司），1967年6月16日，第1版。
- ㉕ 三連××揭發：〈蔡永祥連隊怒斥龍潛之流〉，《革命造反報》，1967年8月22日，第4版；辛吉成：〈揭發〉（1967年8月16日），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13。



- ⑤ 張春橋：〈去上海虹橋機場對浙江赴京代表團講話〉，《錢江評論》（革造總），1967年8月12日，第1版；《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60。
- ⑥ 周恩來：〈接見浙江省代表〉（1967年6月13日），載《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366-69。周恩來等人6到7月間的談話，參見《錢江評論》，1967年8月12日，第1-4版。
- ⑦ 政治部部分幹部戰士：〈避難所見聞〉，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32；何以祥：〈在《向部隊支左工作提意見會議》上的發言〉，《紅色風暴》，1967年7月12日，第3版；龍潛：〈代表浙江省軍區黨委作關於支左工作組中所犯錯誤的檢討報告（初稿）〉（1967年7月16日），《紅色風暴》，1967年8月7日，第4版。
- ⑧ 中共中央：〈文件〉（1967年7月23日），寧海縣級機關東方紅聯絡站糧食局革命大聯合造反團翻印，無頁碼。
- ⑨ 浙江「省聯總」、「紅暴派」：〈關於浙江問題的幾點協議〉（1967年7月23日），《紅色風暴》，1967年7月31日，第1版。
- ⑩ 降龍兵團：〈揭發〉，載《龍潛之流頑固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第二批材料》，頁5；《浙江「文革」紀事》，頁64。
- ⑪ 林彪、周恩來：〈對省軍管會的指示〉，載杭州市大中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總部：《紅衛兵特快通訊》（出版資料不詳，1967），頁2。獨立2師原為浙江省公安總隊，負責杭州城內治安，所以和省聯總發生較多衝突。相較而言，獨立1師的態度就不一樣，其部後來是參與溫州支左的主要軍事力量。
- ⑫ 參見《浙江「文革」紀事》，頁6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頁178同樣用了這樣的說法。
- ⑬ 林彪、周恩來：〈對省軍管會的指示〉，頁2。
- ⑭⑮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111；117、120。
- ⑯⑰ 〈中共中央關於改組浙江省軍管會和省軍區的決定〉（1967年8月2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⑱ 瑞安聯總政治部大批判組：〈「聯站」黑後台〉，《井岡山》（瑞聯總），1967年11月18日，第3版。瑞安縣圍城期間的死亡人數應在一百至二百人左右；溫州市內在此期間死亡人數大抵相當。部分瑞聯總的陣亡名單，可參見〈死難烈士萬歲〉，《井岡山》（瑞聯總），1968年10月19日，第2版；瑞安縣在圍城期間具體的陣亡人數根據一位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統計表。筆者也曾經根據原始材料逐條記錄過溫州市區和瑞安縣的死亡人數，但是出處過於龐雜，無法逐條提供。
- ⑲ 浙江溫州火線指揮部調查組：〈「溫聯總」武裝暴匪，慘無人道血洗溫州附屬〉、溫州「工總司」等保衛郵電大樓火線指揮部：〈溫州告急〉，《浙南風暴》，1967年8月5日，第2版；溫總司調研組：《浙江省溫州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第七卷（出版資料不詳，1968），頁54；浙江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浙江省軍區：〈關於金華「八·三」反革命事件的公告〉，《紅色風暴》，1967年8月9日，第2版。
- ⑳㉑ 中共浙江省委清查王張江姚材料組：《「四人幫」在浙江的親信、現行反革命份子張永生的罪證材料》，頁41、31-32；42。
- ㉒ TS與MC的訪談，2016年1月11日。
- ㉓ 其中較為嚴重的如1967年8月20日的新橋事件，6517部隊第11分隊的偵察排被溫聯總襲擊，偵察排排長和副指導員等七人陣亡。參見戰地記者：〈記住這筆血債〉（1967年8月23日），載溫州《專區財司》政宣組編印：《火線通訊》（出版資料不詳，1967），頁18。
- ㉔ 溫總司調研組：《浙江省溫州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第八卷，頁1-13。
- ㉕ 余汝信：《風暴歷程》，上冊，頁597-98；《浙江「文革」紀事》，頁65、69-70。
- ㉖ 〈中共浙江省委關於印發陳勵耘、南萍、熊應堂罪行材料的通知〉（1978年9月12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㉗ 浙江溫州文衛總司紅總司紅溫醫革命造反兵團、「新溫醫集中營」現場展覽會編：《「新溫醫集中營」材料彙編》（出版資料不詳，1967），頁5-6。指示可以在

多份造反派刊物上看到，不一一列舉。其他被定性為叛亂事件的有江西的「贛州事件」和「撫州叛亂事件」，參見〈毛主席對江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指示〉（1967年9月2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③ 此處可以找到四方的印證。首都三司一方，參見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駐杭州聯絡站文革初期紀實〉，頁944；紅暴派一方，參見筆者與徐水良的郵件記錄，2022年12月14日；解放軍一方，參見余汝信：《風暴歷程》，上冊，頁597-98；省聯總一方，參見趙健雄：《中國美院外傳——時代的顏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頁195。

④ 〈省聯總召開「解放沈策大會」〉，《紅色風暴》，1967年10月28日，第2版；〈省聯總召開解放賴可同志電視廣播大會〉，《紅色風暴》，1967年11月6日，第1版。

⑤ 毛澤東：〈關於對浙江「紅暴」應以聯合為原則的批語〉（1967年11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44-45；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正確對待犯過錯誤的老造反派的通知〉（1967年12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頁353-54。

⑥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頁692；溫總司調研組：《浙江省溫州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初稿）》，第十、十一卷。

⑦ 鄭德來：〈憤怒控訴戚慶連、畢庶璞〉，載大會秘書材料組：《控訴揭發批判戚慶連、畢庶璞罪行材料專輯》（出版資料不詳，1977），無頁碼。部隊番號，參見溫州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編寫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12月」，頁2。

⑧ TS與DL的訪談，2015年4月9日；TS與L和C的訪談，日期不詳。瑞安縣在〈通知〉下發後出現的圍剿絕非個例，部隊在12月6日同樣武裝襲擊了溫州的老竹。

⑨ 中共溫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溫州歷史·第二卷，1949-1978》（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頁520。

⑩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對浙江省實現革命大聯合的兩個文件的批示〉（1968年2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件彙編》，頁460。

⑪ 〈中央首長接見浙江紅暴派代表時的講話〉（1968年1月18日）、〈中央首長接見浙江省部隊及省聯總派代表講話紀要〉（1968年1月2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⑫ 浙大「暴動總部」：〈聲明〉，《紅色風暴》，1967年2月17日，第3版。

⑬ 直到1968年的8月30日，對野戰軍掌控省革委會持消極態度的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李國厚，仍可以給溫州軍分區打招呼，讓其否定由省革委會派出的宣傳隊。參見《浙江「文革」紀事》，頁107。

⑭ 據張永生回憶，周恩來主導了浙江文革，並和他在西花廳有過談話。周讓張把華東的一些情況向他匯報，並讓張全心全意投入文革。參見LH與張永生的訪談，2022年8月24日。

⑮ 浙江並非個例，1968年1月，中央同樣要求駐雲南的陸14軍對工8團（雲南「炮派」的武鬥組織）做「政治工作」，工作無效就「用軍隊包圍，搞政治攻勢」。參見周孜仁：《雲南文革史稿》，上冊（Austin, TX：美國華憶出版社，2019），頁290。另據吳法憲回憶，軍委辦事組調動一個排以上的兵力執行任務，都要通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中央文革小組批准，到了1968年5月，手續被簡化為只需要毛、林、周三人的簽名。參見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731。